

從社會發展的觀點 看台灣的人才流動

郭正昭 2015年10月18日

台灣醫學與司法人才流動的分野與對比

俗話說得好：「國之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之將亡，必出妖孽。」此言剖析的社會現象，不是命理的迷信，也不是風水的誣術，而是一種理智的觀察和冷靜的分析，所歸納出的社會規律即所謂「人才流動」。

早在2008年，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(Paul Krugman)即曾撰寫題為「驕傲·偏見·保險」的文章，盛讚台灣全民健保堪稱世界典範。2012年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〈亞洲新視野·台灣醫療奇蹟〉，介紹台灣醫療技術在國際間早已享有盛名，全球前200大醫院中，台灣就占了14家，僅次於美國和德國超越了日本，排名全球第三，也是亞洲第一。

台灣醫療水準的優越性和先進性，乃因台醫療水準高超。基於某些傳統，醫學院聚集了最聰明用功的莘莘學子，所謂「拔尖」，而且醫學系的學生必須接受長達七年的醫學教育，再經過四年住院醫師的嚴格訓練，以及專科醫師考試才能成為合格的主治醫師。從一個醫學系學生到主治醫師的地位，必須經歷12年漫長歲月的培養，而其訓練過程又極其嚴謹。

與醫學人才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台灣司法人員(包括檢察官與法官)的粗製濫造。

從人才養成教育檢驗，法學院的教育體系與司法人員的培植過程，其落差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就筆者視野見證所及，幾個在台灣司法界服務的朋友，位尊至庭長之流，亦無體現司法的尊嚴和審判的超然思維與風度。當他們考進法律系，就以高考司法官為既定目標，抱著「六法全書」死背，什麼「法理學」、「倫理學」、「法源學」、「法律哲學」等課程均無所關注，置之度外，完全復古中國專制傳統時代，科舉考試教條式的習性。等到考取司法人員資格，便坐等升官發財，走馬上任。

如此不僅法學知識匱乏，也欠缺社會經驗，更遑論專業精神的倫理操守了。於是司法界不斷推演醜陋的「官場現形記」，所謂「恐龍法官」更層出不窮。台灣的司法公信力敗壞，民主的法治基礎幾近崩解，製造無數層出不窮、不公不義的「冤、假、錯」案，亟待平反。

筆者旅美四十餘年，曾經三度應「大陪審團」(Grand Jury)徵召為「大陪審員」，赴高等法院參與刑案審理，從「無罪推定」、「程序正義」、「證據法則」、「量刑比例原則」、「經驗法則」到「超越合理懷疑」(Beyond Reasonable Doubt)的法律邏輯與倫理，筆者深刻感受到美國法治的威信，從法官法學知識的淵博、態度的謹嚴、人情的通達等均有其卓越性，非常人所可企及。台灣與美國司法人員素質落差的根源，必須從「法學院」(Law School)的教育體系尋找癥結。

台灣的變革與維新，千頭萬緒，百廢待舉。而其關鍵樞紐乃在「人才流動」，一切必從人才的培育的根本做起。根據國民黨統治的潛規則，司法人員乃控制人民的工具，因此必須是充滿「黨性」的人。

根據說文解字分析，「黨」乃「尚黑」之物，且頭上高懸三把刀，凶險無比，具有暴虐的殺伐之氣，是冷酷殘忍的象徵。如何能要求他們實踐仁民愛物之心，為社會主持公平正義。他們審理案情，濫用「自由心證」隨心所欲，每深陷於黨同閥異的偏執見解而不自知。何況貪污腐敗的交易橫行，民間遂流行一項不堪諺語：「有錢判生，無錢判死。」

國民黨革命百餘年，迄未轉型民主化，其統治模式仍極端守舊地停滯

於封建父家長制的領導，演化成一黨專政、一人獨裁的人治傳統。與現代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憲政「法治」(Rule of Law)南轅北轍，完全無法相提並論。如果從建國觀點，審視台灣的變革與維新，那麼司法體系的改造，包括司法人員的培養和訓練、大法官的任命程序等，都必須徹底脫胎換骨，特別是廣納歐美的「陪審制度」(the Jury System)，堅守「司法獨立」的民主原則，嚴格監督司法人員的品格操守和專業倫理，廣大人民的權利始能獲得公平正義的保障，享有「免於恐懼的自由」(Freedom from Fear)。

追溯台灣醫學的先進性

薈粹英國、日本、美國的優良傳統

台灣醫學的先進，乃薈萃了幾個現代化的優越傳統塑造而成。一是150年前(即1865年)肇始於英國「自由教會」(Free Church)，「醫療傳教」(Medical Missionary)的傳統，以蘇格蘭「愛丁堡大學」(University of Edinburgh)神學院與醫學院為據點，培養出一大群兼具神學造詣與現代醫學知識的傳教士，以「治病救人」的信仰模式，到世界各地廣佈福音。

偉大先驅者——李文斯頓(David Livingstone, 1813-1873)冒險深入「黑暗大陸」(Dark Continent)非洲中南部蠻荒之地，其傳奇的事跡傳頌千古。死時非洲人竟以「救世主」的規格加以膜拜，且堅持將其遺體埋葬於非洲。幾經談判折衷，英國政府才得以將李氏的心臟回歸故土，並奉祀於西敏寺，供帝國臣民追思。

秉持李文斯頓醫療傳教的典範性，引發了英國自由教會的一股風潮，單是長老教會(Presbyterian Church)，先後來台的傳道者約百餘人，包括馬雅各(James Maxwell)、蘭大弼(David Landsborough)與馬偕(George Mackay)，從南到北，他們分別創辦了高雄紅樓醫院、彰化基督教醫院和淡水馬偕醫院。馬偕醫院的醫學研究更提昇到「遺傳學」(Genetics)的領域，以林媽利教授為主的團隊，運用「基因圖譜(DNA)」的方法論，創造性地發現台灣人的血緣是極其複雜的，否定了「炎黃子孫」、「純中國人」(Pure Chinese)等意識形態無稽的論調，確立了台灣人的「自我認同」，貢獻巨大、影響深遠。

從「化外之地」、「瘴癘之鄉」 到「美麗之島」、「文明之邦」

當清初的康熙帝殲滅明鄭王朝，進據台灣為其殖民地。清帝國朝野對這個海島的形象是「化外之地、瘴癘之鄉」。當時有數十種南島語系的原住民盤據島上，他們仍殘存著獵人頭的野蠻習性。更嚴重的是十餘種瘟疫，包括「鼠疫(黑死病)」與「瘧疾」等橫行無忌。台灣不但是野蠻的化外之地，而且是恐怖的瘴癘之鄉。

滿清殖民統治台灣兩百餘年，官僚階層均視海島為畏途，迴避唯恐不及。從「化外之地、瘴癘之鄉」到如今的「美麗之島」與「文明之邦」，有些歷史軌跡和社會脈動是台灣人民必須審視和尊重的。

日治時期，台灣醫學領域出現許多關鍵人物，其中尤以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貢獻最大。他早年留學德國，有深厚的醫學背景，把十九世紀西方最先進的醫學知識和醫療制度引進來，特別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建設尤堪推崇。從1896年據台之初，為了控制鼠疫疫情，派遣醫學專家來台調查研究，直迄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，所有瘟疫幾乎絕跡，乃何等卓越的奇蹟呢！

當代台灣「美麗之島」與「文明之邦」的美名，是經過現代醫學洗禮的偉大成就。

台灣現代化建設必須均衡發展·始能臻入文明境界

相對於台灣醫學的獨樹一幟，備受國際輿論推崇，相反的，最受詬病的另一面乃是政治民主化過程，衍生的社會分裂與惡鬥的亂象。我們前面的論述曾提到「司法獨立」的困境，乃根源於國民黨「一黨專政」、「一人獨裁」的封建家父長制的「法統論」意識形態，迄今牢不可破，蔚為台灣現代化、文明化改革前進的最大障礙。(請參閱拙作《國民黨末日殘餘勢力的最後堡壘：法統論》)

2016年台灣總統與國會的選舉，出現許多前所未有的荒謬景象。豈有總統候選人三個月前還換將的道理！更詭異的是執政的國民黨猛打危機的恐嚇牌，而在野的民進黨竟然鼓吹穩健的安定牌。而國民黨內的敢言之士

，群起吶喊亡黨亡國的呼聲，形同哀鳴，幾成葬禮的輓歌，乃極端不祥之兆。馬政權的護法，理律的陳長文看到黨國領導者荒腔走板的表現，他忽然覺得這樣的國民黨可能還是倒了好！另一個保守派評論家唐湘龍也口出激越之詞，預見明年一月，國民黨將關門大吉！楊志良則怒嗆：國民黨解散算了！前監察委員周陽山說：這樣一個沒有主義，沒有思想的黨，還能在政壇倖存下去嗎？國民黨自己人自我批判竟如此嚴厲，情何以堪！

一個現代化民主社會，絕對不能容許階層化的罪惡，讓黨國權貴、門閥世族、富商巨賈的階級世襲化。

熱切呼籲台灣精英之士回歸政壇 立志做一個政治家

筆者研讀歷史，最欣賞美國獨立革命，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和開國元勳的高尚言行與人格特質。善良、正直、誠信、公義的美德之外，最基本的情操還是「國家認同」(National Identity)，對斯土斯民的篤愛與忠誠。黨國心態的遺毒瀰漫，所以污染大地、禍害人心，乃是他們犯了「分裂症候群」。一個吃台灣米、喝台灣水，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台灣人，爲什麼就爲了鄉愁所凝聚的虛幻的情結來背叛斯土斯民呢？爲什麼不選擇做一個原鄉的歸人，安身立命呢？爲什麼要做一個異鄉的過客，流離失所呢？形同遊魂呢？

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逾七十年，兩蔣時代厲行戒嚴統治與白色恐怖，「二二八」一役台灣知識精英慘遭集體屠殺，驚恐之餘，萬馬齊喑，噤若寒蟬。「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」一舉斷絕了問政之路。但台灣人民的族群性格是頑強而堅韌的，從艱險的街頭抗爭，終於開拓出一條民主坦途。

於此懇切呼籲新世代精英之士，兼具領導才華者，應回歸政壇，多方參政。就像台灣醫學界揚名於國際一樣，人才流動導向所趨，台灣政壇將巨擘輩出，志士仁人的群體之中脫穎而出的卓越者與政治家，就是我們殷切期待的「開國元勳」(Founding Fathers)了！